

苏联

与

拉丁美洲

[美] J·格雷戈里·奥斯瓦德

主编

[德] 安东尼·J·斯特罗维尔

上海人民出版社

苏联与拉丁美洲

〔美〕J·格雷戈里·奥斯瓦德
〔德〕安东尼·J·斯特罗维尔 主编

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Edited by
J. Gregory Oswald and Anthony J. Strover
THE SOVIET UNION AND LATIN AMERICA

Praeger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1970

根据纽约普雷格出版公司 1970 年版译出

苏 联 与 拉 丁 美 洲

〔美〕J·格雷戈里·奥斯瓦德 主编

〔德〕安东尼·J·斯特罗维尔

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00,000

1974年11月第1版 197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统一书号: 3171·129 定价: 0.67 元

内 部 发 行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根据 1968 年 5 月西德慕尼黑苏联研究所举办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论文汇编而成的论文集。

论文集的作者来自西欧、北美和拉丁美洲等地区。主编人奥斯瓦德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俄国史教授，编译过《苏联心目中的当代拉丁美洲》一书，同时为一些杂志写过不少有关苏联与拉丁美洲关系的文章。另一个主编人斯特罗维尔，一度在英国剑桥大学专门研究苏联与拉丁美洲问题，现在慕尼黑苏联研究所任编辑。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考察苏联与拉丁美洲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历史关系，时间从老沙皇在巴拉那河口和巴西建立“斯拉夫移民居留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止；二是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东欧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其中尤其对六十年代苏修在拉丁美洲的战略作了一些分析，指出苏修为了达到它在“拉丁美洲的长远政治目标”，即把拉美纳入它的“势力范围”，正从各方面对拉美进行渗透；三是分析卡斯特罗当政以后的苏古关系，这是本书的重点。论文集叙述了苏古关系演变的几个过程，揭露了苏修利用“贸易”、“援助”等手段以达到政治上控制古巴的目的。同时还涉及到古巴

革命的道路、德布雷的“游击中心”思想等内容。本书为我们了解苏修对拉美的渗透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

由于论文作者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看问题的，因此，书中充满着资产阶级的观点，如把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与拉丁美洲的关系同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后两者间的关系混为一谈；把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机会主义派别同一些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不加区别；把各种机会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等等。这些，是我们在阅读时要特别注意加以批判的。

参加本书译校工作的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国际政治系、经济系的部分同志。限于水平，错误与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目 录

序言	1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苏联与拉丁美洲的关系	
..... 史蒂芬·克利索德	21
苏联对伊比利亚世界的影响	塔德·苏尔克 32
苏联与拉丁美洲的文化关系	拜兰·李查和凯瑟琳·夸克 41
苏联在拉丁美洲的战略	阿尔贝托·丹尼尔·法列罗尼 54
苏联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几个方面	恩里克·E·里瓦罗拉 82
人民斗争的新阶段	维克多·V·沃尔斯基 92
苏联政治经济学家对拉丁美洲的研究	
..... J·格雷戈里·奥斯瓦德	98
巴西与东欧的关系	何塞·奥斯瓦尔多·德梅拉·彭纳 109
古巴在苏联的拉丁美洲战略中的地位	
..... 沃尔夫冈·W·贝尔纳	121
古巴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和关于第三世界策略的影响	
..... 罗伯特·K·弗尔塔克	134
1963—1968 年古巴经济与苏联集团——评论	
..... 罗伯特·F·兰伯格	156
卡斯特罗主义的策略	鲍里斯·戈登堡 170
古巴与共产主义世界的关系	彼得·申克尔 197
卡斯特罗主义者向共产主义挑战	凯文·德夫林 214

雷吉斯·德布雷：卡斯特罗共产主义的鼓吹者·····	
····· 弗洛伦斯·梅梅加洛斯·····	235
编后记····· J·格雷戈里·奥斯瓦德·····	251
作者介绍·····	257

序 言

拉丁美洲、欧洲和北美的学者、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共五十三人，于1968年5月20日至21日在德国慕尼黑的苏联研究所聚会，参加关于苏联与拉丁美洲关系的一次国际性学术讨论会。苏联的拉丁美洲专家，如莫斯科苏联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维克多·V·沃尔斯基博士和该院历史研究所的莫伊塞·S·阿尔彼罗维奇教授曾被邀请提供论文并出席会议，但未到会。

本书刊印的论文曾先在会上予以介绍，作为会议参加者评议和讨论的基础。正巧这些论文遵循明显的顺序，同时主题也比较集中而不太分散。讨论会主席绝对无意要求作者们撰写某一个专题。结果，在他们的作品中出现了三个主题。第一个是历史的考察，就是从历史上观察苏联同拉丁美洲某一国家以及全区之间在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关系。这一方面的论文有史蒂芬·克利索德、塔德·苏尔克、拜兰·李查同凯瑟琳·夸克合著、阿尔贝托·丹·法列罗尼以及恩里克·E·里瓦罗拉大使等的著述。

第二个主题有两篇论文，讨论苏联-拉丁美洲经济关系的一些学术性和实际性的观点。首先，J·格雷戈里·奥斯瓦德探讨了当代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研究拉丁美洲社会几种经济成分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另一方面，何塞·奥斯瓦尔多·德梅拉·彭纳大使由于对巴西与苏联和东欧国家贸易关系的现实中的利弊有第一手材料，所以他从这个有利地位出发写出了他的论文。

第三个主题有一组论文，集中讨论1959年以来的苏-古关系。

在讨论会上之所以非常强调这些关系，是由于它对苏联在拉丁美洲的活动占有支配一切的重要地位。沃尔夫冈·W·贝尔纳、罗伯特·弗尔塔克、罗伯特·F·兰伯格、鲍里斯·戈登堡、彼得·申克尔等博士、凯文·德夫林先生和弗洛伦斯·梅梅加洛斯小姐的七篇论文，论述了有关战略、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这一重要而且也许是中心的问题。现在就把一些基本主题的简要讨论写出来作为这些论文的一个总绪论。

对苏联与拉丁美洲的关系作一般性讨论的，首先是史蒂芬·克利索德的论文，它考察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些活动的历史。

克利索德先生指出，苏联早期太忙于别的事情，顾不到拉丁美洲。它和这个地区没有政治、经济或文化上的联系，因而不存在帝国主义劣迹，有不需要以后做好事来加以洗刷的有利条件。同样，由于大多数拉丁美洲人对俄国的无知，使得他们对这些布尔什维克开头好多年的尝试倾向同情。俄国人，包括列宁本人在内，差不多都同样不了解拉丁美洲。

苏联派到拉丁美洲去的第一批特使之一是米哈伊尔·鲍罗廷，他在设法把皇室珠宝偷偷运去作为新大陆共产主义运动的经费失败之后，在墨西哥结束了他的工作。鲍罗廷见到了卡兰萨总统，建议成立第三国际拉丁美洲支部，但是为卡兰萨所拒绝。以后，墨西哥共产党发动了中美其它地方和加勒比海沿岸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但在本国却很少进展，墨西哥宁愿按自己的方式实行本国的革命。结果，共产国际就对墨西哥的革命领袖们加以敌视。但是在1924年，墨西哥和苏联还是建立了外交关系。由于共产国际干预墨西哥的内政，双方关系在1930年发生破裂，波特斯·希尔总统断言，“驻墨西哥的苏联使馆是宣传和政治骚乱的中心”。断绝外交往来是苏联-墨西哥关系的一个挫折，直到1942年11月它们才恢复正式关系。

在南美,苏联在乌拉圭和阿根廷的影响最大。阿根廷共产党是拉丁美洲第一个加入共产国际的,这个国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设有书记处执行任务。1927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设立了俄国商务代办处的分处,名称叫做“乌山陶格”(Yuzhamtorg),接着做了一些生意,但是苏联的输入超过输出。1931年7月,由于受到这种可能符合实际情况的指责,即在“乌山陶格”和拉丁美洲共产党活动之间有联系,这个分处便被阿根廷当局封闭了。此后,“乌山陶格”迁往蒙得维的亚,1934年在那里设立了外交使馆。

共产国际一直没有把拉丁美洲任何有威信的人物争取过来,直到1931年巴西的L·C·普列斯特斯才宣誓效忠于莫斯科所指导的组织。1935年11月,普列斯特斯领导的一次革命总起义被镇压下去了。这件事使得乌拉圭断绝了同苏联的关系,原因是普列斯特斯的巴西起义是由驻蒙得维的亚的苏联大使馆暗地发动的。这次破裂剥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设在拉丁美洲的最后一个官方据点。共产国际继续进行活动,但是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当地的共产党是被禁止的,或者没留下什么影响,只是在智利有一个不大突出的例外情况,但共产党的成功并没有给莫斯科带来什么好处。

照克利索德的判断,两次大战期间,在苏联和拉丁美洲的关系上,苏方的决算表无疑是负的。据他的理解,原因在于有一个矛盾难以调和,即苏联政府既支援革命团体,同时又要发展同这些团体所正要推翻的那些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其次,由于苏联对拉丁美洲的无知,对它的传统、特点和领导人的蔑视态度,以及与此相应发生的把不恰当的榜样和策略强加于人的倾向,使苏联人吃了亏。作者最后说,虽然前一时期有些教训似乎已被接受,但是,在新的形式下老矛盾今天仍然出现。

继克利索德先生发言之后的讨论中,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

赫伯特·丁内施泰因教授说，苏联对待拉丁美洲的态度是和美国相似的。这就是殖民主义的态度；苏联对美国的强大存有戒心，对拉丁美洲的贫弱有轻蔑感。戈登堡博士补充说，俄国人对各国共产党究竟有多少党员一点也不知道。在拉丁美洲，虽然革命活动和革命词藻多得很，但是，对拉丁美洲的革命者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毫无意义的。他们所要的只是“革命”。人们不能怪俄国人的失败。

新闻记者塔德·苏尔克在他的论文中所表示的意见是，古巴的经验已经教训了苏联在地理和经济两方面过分扩张的危险性。他觉得，苏联人近年来正在谋求同拉丁美洲保持更加圆滑和代价较少的关系，他们今天在这个地区的影响正处于顶峰。苏尔克先生也许多少有些同意本讨论会中两个拉美撰稿人（里瓦罗拉大使和梅拉·彭纳大使）的见解，即对意识形态渗透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他认为，这种影响并没有表现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力量的抬头。

拜兰·李查先生和凯瑟琳·夸克小姐的论文，是关于苏联文化的定义和苏联与拉丁美洲文化关系的研究，并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历史地追溯到现在。作者们说，从最早时期起，苏联文化政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消除拉丁美洲对它的不信任。这种政策结合技术上的成功（如人造卫星）和艺术上的成就以一种文化攻势执行下来，这种攻势也意味着强调他们所自称的苏联制度要比西方优越。苏联文化工作方案中的特殊项目，比如，也符合赚取外汇这一目的的民间舞蹈大合唱的巡回演出，通过大量出版拉美作家的著作料定会赢得他们的同情，所有这些在论文中都给描绘出来了。论文中说到了拉丁美洲的苏联友好社团，同样，也提到了在莫斯科帕特里斯·卢蒙巴大学留学的拉美学生人数惊人增长，他们由1960年的一百四十四人增加到1966—67年的一千人以上。

阿尔贝托·法列罗尼先生提出了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共产党在拉丁美洲所采战略和战术作的一个全面考查。他的文章历述了自1952年以来苏联共产党各次代表大会对拉丁美洲所采取的官方立场，并就苏联在古巴的文化和经济攻势作了详细的分析。法列罗尼从苏联农业经济学家所写关于拉丁美洲土地问题的文章中作了一些选录之后，弄清了苏联学者支持拉丁美洲农村的社会经济革命不是一时的兴趣。他相信，如果拉丁美洲的自由事业得到保护的话，苏联的战术就需要一种根据历史现实而不是经验理论制订的相反的战略。

阿根廷大使里瓦罗拉在他的论文中，考虑了在他看来是过去和现在同样限制了苏联与拉美关系正常化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他举出欧洲干涉西半球事务引起的历史性恐惧。随着外交关系的建立，悄悄引进了共产主义和革命的意识形态，这对于拉丁美洲的一些政府也是接受不了的。但是，里瓦罗拉大使认为，“共产主义威胁”的说法，往往因为国内政治上的理由而说得过火了，同时，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常常决定着拉丁美洲的态度。

虽然大部分拉丁美洲地区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似乎是有利于(共产党人)“颠覆”的沃土，但是作者觉得，伊比利亚-印地安群众^①对共产党宣传的不易感受，使得重复古巴的经验是困难的。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经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进一步说，虽然“苏维埃国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颠覆”等名词从“概念上讲都是有所分别的，然而有时在改变共产主义的战略时却又混在一起”。他看到，在未来的年代里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如果西方世界的发达国家不采取有效行动帮助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国家，苏联就可能要充当这个角色。他又断言，苏联这种对开发事业的援助，可以消除人们对于“共产主义的幽灵”的畏惧。拉丁美洲和

① 伊比利亚-印第安群众，指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后裔。——译者

苏联的贸易和外交两方面的关系（对此，他认为是必要的）都在增进中，并可能要继续增进下去。里瓦罗拉大使说明了拉丁美洲一般所抱的态度之后最后说，因为害怕共产主义的扩张而杜绝贸易和外交关系一定是违反生产发展的，如果实行这种作法而又没有促使经济进展的切实打算相配合，那末，结果就会更加不利。实际上，如果拉丁美洲的经济不发展，而预期来自美国的又只是少量救济性的援助，大使认为，苏联可能会在较大的发展方面承担任务。

关于拉丁美洲政治经济和贸易的讨论，由奥斯瓦德教授的评论开始，他肯定地说，苏联学术机关和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指导使得人们相信，苏联人关于拉丁美洲的经济著作和研究，目的都在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强调了这一点的重要意义之后，他要人们注意苏联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公开支援。他进一步说，为了在拉丁美洲鼓动社会主义和促进民族解放战争，“苏联学者们曾大力分析了中产阶级和社会民主改革运动”。苏联的拉丁美洲学者关于阶级结构的分析，一般说来没有传统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所作的解释那样严格。民族资产阶级——即中小商人和大多数领薪水的劳动者——被认为是重要的，因为他们对工人阶级有影响，并且有潜在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倾向。按照苏联人的分析，保守势力是农村的寡头、富有的资产阶级和美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帝国主义。拉丁美洲的政权被苏联学者给以高度评价的，是夸德罗斯和古拉特的；酌加赞许的是鲁伊斯·科蒂内斯和洛佩斯·马特奥斯的政权；而佩雷斯·希门尼斯、罗哈斯·皮尼亚和劳雷亚诺·戈麦斯等的独裁政权，不用说是最低的一类。

苏联作家们详细讨论了城市工人阶级和劳动问题。他们把拉丁美洲的工会归入资产阶级御用团体一类。他们把那些加入与美国劳联-产联有联系的美洲区域工人组织的分子称之为资本家的

同伙，并指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敌人和分裂工人的制造者。

苏联分析家们虽然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寻找土地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他们认为这是不行的。只有古巴的土地改革方法是他们所赞成的，至于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的土地改革，则认为不符合苏联的标准。

论文的作者接着说，在苏联经济学家们的眼里，拉丁美洲首要的工业问题是和“经济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外国投资太多。苏联人赞成向国家资本主义（官方投资和经营）前进，但须由“进步势力”控制，而不和赞助外国投资者的“亲帝国主义分子”结成联盟。他们说，墨西哥的模型是错误的，因为这实际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隐藏在混合公司名义之后的“外国垄断资本”。

有一个苏联作家把“争取进步联盟”说成是旨在防止根本性的社会改革，另一个作家说是用来“增进美国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和解”的一种企图，从而达到它的真正目的——使这些阶级脱离民族解放运动。据引证，还有一个作家说过，联盟是一种“画饼充饥”的想法（这种非议有时听起来觉得更中要害），是一个“希望中的和平革命”，这些都是不能带来所需要的社会变革的。

苏联作家们批评拉丁美洲的市场一体化的计划，因为他们说这是把你争我夺的经济合并起来，苏联人建议代替的办法是和社会主义国家扩大贸易，说这些国家的经济能够补充拉丁美洲经济之不足。一个著名的苏联经济学家很奇特地运用了双重标准的论断，他认为，对拉丁美洲提供国际信贷，只要贷方是非共产主义国家，那就是经济帝国主义；他说，如果提供信贷的国家是属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那就是进步的经济发展。苏联学者们注意到，美国政府对拉丁美洲放款和信贷的不断增长是有重要意义的，他们认为这是基于保持美国私人资本向这个地区输出的有利条件这一愿望而来的。

奥斯瓦德教授扼要地说，照苏联人的设想，拉丁美洲的正当道路在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以及同苏联及其东欧贸易财团保持直接的金融、技术和贸易关系。

继奥斯瓦德的发言之后，美国国务院的格雷戈里·沃尔夫先生在他的评议中答复了苏联人关于美国同拉丁美洲中产阶级商务关系的批评。他提醒讨论会说，美国对拉丁美洲各个阶级并没有先入成见。因为不相信阶级学说，美国的生意人就能灵活地同各色各样的人一起工作。至于说到民族主义可能是使中产阶级起来革命的一个因素，沃尔夫争辩说，情形倒更可能是相反的，拉丁美洲中产阶级的成长有助于政治上的安定。他最后说：“不要把急躁情绪和革命行动混为一谈。”

丁内施泰因教授说，讨论会是在讨论两个破产的理论。第一个是“共产主义的革命”，第二个是“进步”的观念，这两者没有一个适用于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者的悲哀在于工人阶级不是革命的而是向往消费的。他说，如果苏联作家们讲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者，他们就是在强迫人们接受一种破产的理论：“……苏联作家们必须写出一些东西来。其实他们并不相信这回事。”丁内施泰因也怀疑把大量金钱注入拉丁美洲就会保证这个地区有秩序地发展。“什么美国体制，苏联体制，都是胡说八道……而且因为苏联人在拉丁美洲做得不多，所以他们造成的损害也比美国人少。”

对拉丁美洲有些国家来说，它们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是微不足道的，关于这类贸易的利弊问题的讨论，大体是理论性的，并且往往随意搀进一些动感情的词汇，几乎把论点都淹没了。

只有巴西同苏联和东欧国家有了相当大量的贸易（年平均额：出口一亿美元，进口一亿八千万美元）。因此，这个有影响的国家同东欧国家间的实际经验，给考察这种贸易的种种含义提供了一种实例的研究。在南美洲，或许不存在一个在技术上比巴西更发

展、做法上更老练的国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巴西有能力处理好它同苏联的贸易关系,可以作为一种有益的典型和标准,用这种典型和标准来评价其它拉丁美洲国家,并供它们作出自我判断。

或许心里有这种想法,何·奥·德梅拉·彭纳大使用巴西的观点介绍了他的国家同苏联及其盟国的贸易经验和政策。前途怎样,这是巴西官方的事,但是说到近几年来巴西保守政府所采取的办法,就完全是实用主义的。正如梅拉·彭纳所说的:“俄国外交官们自己供认,在所谓1964年3月的‘军事政变’以后,巴西政府的官员比以前更容易对付了。”显然,反共的巴西政府表示它完全“准备把意识形态问题和贸易分开”。人们看出它之所以采取这种立场的动机,是由于外汇问题,并且,如果不这样做,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巴西的咖啡、可可、食糖和玉米等过剩产品就有困难,同时也由于需要吸引投资来发展经济。

梅拉·彭纳承认,关于巴西对东欧集团现行贸易政策的利弊问题,有着“激烈的辩论”,他把他的论文的一半篇幅用来专门考察各种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公认的一个极其不利之点是由于在同东欧国家的贸易中使用了换货制,虽然事实上这种贸易对巴西产生了顺差(它的输出超过了输入),但实际上,巴西是以有利于贸易对方而付出了贸易补贴的。另一方面,这种弊害的严重性又得到了补偿,因为有这样的事实,即出口信贷主要来源于过剩存货如咖啡之类的销售,这类东西如果不这样卖出去,在自由市场上是不能成交的。作者用同一个理由反对另一种议论,即巴西由于在换货制(彭纳把这叫作“抵销制”)的基础上和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使它自己得不到硬通货。巴西在实行这种换货制上存在的问题,是刺激来自对方的抵销差额的进口。这被看作是巴西“成熟和发展的性质”的表现,同时也是由于在购货上缺乏严格的政府集中管制的结果。

有一种议论说巴西输出到东欧国家的咖啡又被它们用来向西方输出，因而直接和巴西以硬通货而销售的咖啡进行竞争。梅拉·彭纳否认这一说，并认为，总的说来，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他写道，事实证明这种情形是稀少的，不足以用来谴责和东欧的贸易关系。他还相信，和社会主义国家贸易并不为意识形态的渗透开辟道路，也不危害他国家的安全。他说，巴西成熟到了不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混在一起的程度。他觉得，事实上，这种贸易倒可能对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影响，因为它有助于“他们缓慢的民主化过程”。

梅拉·彭纳提到巴西从俄国、捷克、波兰和东德进口的装备和机器质量低劣，后勤工作薄弱。结果，这些项目的进口只占巴西从苏联和东欧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十五。进口的主要产品是石油、煤和小麦。进口的大部分是以政府与政府的交易为基础的。照梅拉·彭纳的看法，社会主义国家的商务代表们太注重公家方面的主顾，不注意把贸易引到私人主顾方面来。在巴西的生意人方面，也有助于造成这种局面，因为他们在和共产党人打交道时总是提心吊胆。关于这一点，有一个生动的例证：1966年年中，苏联放出一笔一亿美元的信贷，到1968年年初只利用了五百万美元。

梅拉·彭纳着重指出了苏联人缺乏对巴西情况的了解。他说，他们有错误地认为巴西屈从美国这种倾向，并且按工业发展的条件，妄把巴西列入印度和埃及一类。他注意到，在一些大规模的计划上，苏联人不能提供相等于从西方国家获得的信贷便利。

梅拉·彭纳从最近巴西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协定中，看出一种未来和东欧进行贸易的可能类型，依照这个协定，换货制取消了，实行的是硬通货交易。但是，这里有一种易于由贸易顺差转为逆差的危险。梅拉·彭纳最后说，“在和社会主义国家贸易中，我们将经常处于某种不利的地位：如果实行‘抵销制’，我们向他们买